

梁启超



本编不可以作教科书，其体裁异也。
惟有志之士，欲从事修养以成伟大人格者，
日置座右，可以当一良友。

——梁启超《德育鉴·例言》

梁启超／编著 彭树欣／整理

修身三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梁 启 超

修 身 三 书

本编不可以作教科书，其体裁异也。

惟有志之士，欲从事修养以成伟大人格者，

日置座右，可以当一良友。

梁启超／编著 彭树欣／整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梁启超修身三书 / 梁启超编著; 彭树欣整理. —
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6. 5
ISBN 978-7-5325-7827-6

I. ①梁… II. ①梁… ②彭… III. ①梁启超
(1873~1929)—思想评论 IV. ①B259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8151 号

梁启超修身三书

梁启超 编著

彭树欣 整理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36.75 插页 5 字数 460,000

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7827-6

B·917 定价: 79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编者前言

梁启超(任公)身跨政、学两界,名满天下,著述宏富,于当时后世影响巨大。然而,在今天很多人心目中,其形象却飘忽不定,以致有研究者称其人多变无恒守,其学多面无统绪。其实,任公一生跌宕起伏,其行动主张固然多所变更,其中却有一以贯之者;其学问涉猎极广,多所开创,其中确有统摄全局者:其一贯、其统绪正是中国传统的修身之学。而这一点被我们大大地忽略了。

梁任公的修身之学奠基于万木草堂时期,深化于戊戌变法之际,确立于游历美洲之后。政治行动的挫败,促使他从政、学两方面深入反思:为政者缺少修身工夫,则内心无主宰,行动无根柢;为学者如无修身工夫,则知识愈多,愈为作恶的工具。他总结清代以降的政治:曾国藩走的是“道德改造”路线,从改造自己做起,然后砥砺朋友,找到一个是一个,终于开创了一片新天地;继之而起的李鸿章转而走“功利改造”路线,以功利为本位,专奖励一班有才能而不讲道德的人,政局无可避免地衰敝下去;袁世凯则更以富贵为本位,变本加厉,明目张胆地专门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做爪牙,天下事遂不可收拾。这种风气蔓延到社会上,“现在一般人,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,而且想把他

留下的残馀，根本去划除”（《梁先生北海谈话记》）；表现在教育上则是“智育日进，而德育日敝”（《节本明儒学案》眉批）。概括言之，政治、社会的败坏在于重功利而轻道德，轻道德的根源在于传统修身之学的衰落。

1903年之后的梁启超，其自立立人的宗旨确立为以道学统驭科学，以德育统摄智育；德育的内容则为先私德后公德，即以传统的道德学问为本；德育的方法则是从个人修养做起，推己及人，即回到传统修身为本的正路上去。此是任公的“晚年定论”，是他此后巡回各地演讲和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初衷，也是他编撰和出版《德育鉴》《节本明儒学案》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三书的原由。

不幸的是，梁任公当年的大声疾呼并未改变历史的进程，其对前途的担忧早已成为现实：那之后的政治改良固路漫漫其修远兮，今日学界之腐化堕落亦有目共睹，学校则适成为“贩卖知识杂货店”（《为学与做人》）。然则任公之努力果无意义乎？修身三书的出版，当时就深刻影响了一批士子如蔡锷、徐志摩、梁漱溟的人生道路，谁说不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？

任公有诗云：“世界无穷愿无尽，海天寥廓立多时。”今天重印是书，名之曰《梁启超修身三书》，固在继承先生之遗志，亦以还任公真面目与世人。

三书之所由作，乃为修身实践作指导，一面总结了修身之学的道理和方法，一面结合任公自己的亲身体验，谆谆提醒工夫的要点。惟愿有缘读是书者，如任公所期望，真实做修养工夫，幸勿以思想资料视之！

刘海滨

2016年4月7日

导 读

一、梁启超与修身之学

梁启超(1873—1929),字卓如,号任公,又号饮冰室主人,广东新会人。他不仅是近现代政坛上的风云人物,而且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。其人早慧,12岁中秀才,17岁中举人。24岁主办《时务报》,名噪一时,以至上自通都大邑,下至穷乡僻壤,几乎“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”。1898年与康有为等人发动戊戌变法,史称“康梁”。变法失败后,他流亡日本,先后创办、主编《清议报》《新民丛报》《新小说》等报刊,虽身居海外,仍执国内言论界之牛耳。民国初期,梁氏先是活跃于政界,出任司法总长、财政总长,并与蔡锷一起策划起兵反对袁世凯。后息影政坛,耕耘于教育界、学术界,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,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。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活力和影响,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。

在梁启超这些成就的背后,有他的人格力量在作支撑,而其人格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中国古代一门根本性的学问——修身之学。尽管这门生命的学问在近现代因不被重视而逐渐湮没,但梁氏却浸润其中,生命得以涵养,人格得以陶铸。不仅如此,他还着力挖掘、整理这

种学问,将其发扬光大,惠及后人。其中编纂成书的就是我们称之为“梁启超修身三书”的《德育鉴》(1905年)、《节本明儒学案》(1905年)、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(1916年)。这三种书是梁启超对古代儒家修身之学的总结和融会:《德育鉴》按修身的步骤和方法分类摘录先秦、两宋、明清儒家的修身言论,并加按语以阐发其精蕴,提示用功的要领,这可视为一部儒家修身概要之作;《节本明儒学案》是将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中的修身言论节选出来,单独成书,这是一部断代的修身言论集;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是将《曾文正全集》中的修身言论选录出来,编辑成书,这是一部儒家个人的修身言论集。这三种书,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道德读本,曾风行一时。

其实,中国古代修身之学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内核;传统中国人以此安身立命,成就了士君子乃至圣贤之人格境界,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。这正是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的根本原因之所在。因此梁启超说:“天下最大之学问,殆无以过此!”(《曾文正公嘉言钞序》)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整理、出版这三种晚清民国时的修身书的原因。

二、“修身三书”编纂的思想背景

《德育鉴》《节本明儒学案》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的编纂出版,既与梁启超的教育、修身实践有着内在的联系,又与20世纪初其思想的转变密切相关。

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偏居一隅,历史上曾属文化落后地区,但在明代出了一位心学大家陈白沙。白沙心学,开明代学术之端绪;其学以修身为主,偏重内圣,注重人格涵养。一代大家在这一民风彪悍之地向导士风,化民成俗,功显当时,且泽及后世。故直至清后期,新

会人仍延续着陈白沙的思想脉络，乾嘉考据时风熏染不到。梁启超的祖父、父母乃至自己无疑受到了这一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是一名秀才，禀承白沙心学传统，在日用酬酢间践行儒学，砥砺人格。他以宋明义理、名节教导后辈，日与后辈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，而尤喜举亡宋、亡明国难时先贤志士之事津津乐道。父亲梁宝瑛是一位乡绅，也持守着儒家内圣外王之道：“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，淑身与济物而已。淑身之道，在严其格以自绳；济物之道，在随所遇以为施。”^[1]母亲赵夫人，知书达理，相夫教子，谨守家风，以贤淑名闻乡里。祖父、父母的善言懿行、精神人格如时雨之化，渐渐滋养着梁启超的德性生命，并培植了其修身之学的根基。

梁启超对儒家修身之学有一个认识、感悟、体证的过程。他在很小的时候，就接触到了《曾文正公家训》，稍大一点，读全祖望写的黄宗羲、顾炎武两篇墓志铭，内心受到激励。古代儒家哲人的修身智慧如电光石火，开始在幼年梁启超的心灵中闪耀。而梁启超真正关注修身之学是在万木草堂受教于康有为时期。康氏的修身之学主要禀自其师朱九江；朱氏之教，德性和学问并重，授学者以“四行五学”。其中，“四行”即是德性之学，包括敦行孝悌、崇尚名节、变化气质、检摄威仪。此外，康有为隐居南海县西樵山达四年之久，独力为学，以陆王心学和佛学自修自证。康氏的教学重德育，居其教学内容十之七，尤喜以孔学、佛学和陆王心学施教。受此影响，梁启超开始着力读修身之书，如《明儒学案》就是常读的。尽管梁启超也常研究西学、史学等知识性学问，但从未丢弃过这门生命的学问——修身之学，1897年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习时，修身之学即成为其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1898年，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流亡日本，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。在此期间，梁启超通过对前期经历的自省和反思，行动和主

[1] 梁启超：《哀启》，见丁文江、赵丰田编：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7页。以下述及梁启超生平多参考该书，不再出注。

张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。

首先是自我修养工夫更加落实和深入。1900年因读《曾文正公家书》，“猛然自省”。这在梁启超的人生修养中，应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，他开始深刻反省自己，觉得“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”。此年，梁启超设日记自修，以曾文正之法，凡身过、口过、意过皆记之，而每日记意过者，乃至十分之上。此后通过自己的探索、实践，并借鉴古代儒者的修身经验，梁启超最终形成了自己常用的修身法门：一曰克己，二曰诚意，三曰主敬，四曰习劳，五曰有恒。

另一方面，通过对变法失败的反思，他认为，要有新国家，必须先“新民”，于是在1902年创办了《新民丛报》，并开始连载系列文章《新民说》，阐述其新的理论探索。所谓“新民”，意在培养新式现代国民，塑造平民人格。按照梁氏的设想，新民必须兼具中西道德文化素养。所谓“新”有二义：一是“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”，一是“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”。前者是指发扬光大中国旧有的道德、文化，后者是指吸收、融入西方新的道德、文化。但在实际的思想建构中，《新民说》的前期文章主要是用西方的道德、法律观念来塑造国民，并希望全体国民以此自新。然而，到了《新民说》写作的后期，梁启超认识到了“新民”本身的艰难。这一认识的产生，当然有他平时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方面的因素，而其“新大陆之游”，则是一个重要的触媒。

1903年正月，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，开始游历美洲。美洲新大陆之游为梁氏打开了一个新鲜而广阔的西方世界。他既目睹了它的文明和繁荣，也洞察到了它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。这使他对原先理想中的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。其中在旧金山华人区的考察，对他触动尤为强烈。如旧金山华人区报馆之多，令他吃惊；各会馆的运作也仿照西人党会之例，似乎非常文明和缜密。然而他发现，华人只学到了西方文明的形式，其本质依旧未改变，华人区仍是旧时的中国社会。旧金山之行，使梁氏亲身体会到了国民改造之不易，使他不

得不重新思考“新民”问题。因此旅行结束后，他写了《论私德》一文。这是《新民说》后期的一篇重要文章，作者意欲修补其前期过于西化的主张。该文的出现标志着梁启超“新民”思想乃至整个德育思想的转变。

梁启超将道德分为私德和公德，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学问主要属于私德领域。在《新民说》前期，他将公德与私德并列，且着重于引入公德。而在《论私德》中他认识到二者应该是根本与枝叶的关系，“新民”应以私德为本，如果没有私德的培养，“欲以新道德易国民，是所谓磨砖为镜，炊沙求饭也”。公德乃私德在公领域的推广，“公德者，私德之推也，知私德而不知公德，所缺者只在一推”，“是故欲铸造国民，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”。因此，梁启超转而求助于中国传统的道德学问，即儒家修身之学。此时他实际上回到了儒家“修齐治平”的思路，即以修身为本，然后推己及人乃至家国天下。其国民改造或德育思路可以说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：由重国民的改造转为重士人的培养。因他看到改造普通民众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，于是将目光转向了社会精英，认为应先塑造精英，再影响民众。写于1903年的《论私德》，是梁启超的德育思想由“新民说”回归儒家修身之学的前奏。之后，他于1905年又编纂了《德育鉴》和《节本明儒学案》。而1916年编纂的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则是这一思路的延续。

其实《新民说》中对西方道德、文化的提倡，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向西方寻找国民改造资源的一次尝试，只是他思想的一个侧面，梁启超德育思想的根基主要还在中国传统的修身之学中。然而吊诡的是，梁启超的引进西学的“新民说”在“五四”启蒙思潮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运动中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，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，而他德育思想的“晚年定论”虽然在当时也发生过很大影响（详见本文第四节），之后却被我们长期忽视了，他极力弘扬的士人修身传统——中国德育的优秀传统——在其身后的岁月里则逐渐丢失了。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一个国家道德的培养和改造，应主要是

自上而下的。因此梁启超的这一思路,对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现将这三种修身书重新整理、结集出版,意在让梁氏的修身思想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三、“修身三书”的主要内容

(一)《德育鉴》的主要内容

《德育鉴》是梁启超对古代儒家修身之学的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编纂、整理和总结。他先将古人修身之法依照践履的顺序分为辨术、立志、知本、存养、省克、应用六类,然后将先秦、两宋、明清儒家(尤其是陆王心学家)的修身言论摘录、归类其下,并加按语以引伸、指点,以便实际指导人做工夫。下面对其主要内容作一简要介绍:

一曰辨术。所谓辨术,就是辨别个人行为的动机,这是儒家修身的第一步。儒家修身是为了转化、完善自我,这一过程乃是不断去掉“私心”、“私我”,回归“本心”、“本我”的过程。在儒家看来,这个“本心”、“本我”就是道德主体,在本质上乃为他人服务、为社会尽义务而又同时成就自身。辨术包括人己、公私、义利、诚伪之辨,主要是辨别个人行为的动机是自私自利,还是利人利他,目的是去私而为公,消除“小我”而成就“大我”,最后达到人我一体、天人合一的完满状态。此部分所录之言说以及按语,先论辨术之重要性,然后再讲下手功夫和对治方法。

二曰立志。梁启超认为,辨术之后,便须立志。他摘录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和宋明理学家有关立志方面的各种见解,内容非常丰富,涉及立志的意义、如何立志、立志的作用等。又在按语中,特别指出立志的三大作用:一曰必立志,然后能自拔于流俗;二曰必立志,然后他事不足以相夺;三曰必立志,然后进学无间断。

三曰知本。术已辨，志已立，接着便是从何处着手用功的问题。首先，梁启超节录古代儒家的相关言论，以说明为学要“一以贯之”、要“立乎其大”、要有一个“着力处”、要有“头脑”和“主宰”、要有“把柄入手”。这些言论，无非是说为学先要知“本”之所在，知本即知从何处着手用功。其次，是关于如何用功问题。梁氏认为宋明理学家主要有两种用功的路向，一是朱子之路，一是陆王之路；朱熹从外在的格物致知入手，而陆王则回归本心、返诸良知。他认为朱熹之法用于科学研究则可，用于道德修养则不可，陆王之法才是可行、易行的。梁氏所主张的知本，就是要回到王阳明发明的“良知”；其具体工夫，即“致良知”、“知行合一”、“慎独”等。梁启超特别指明，“王学为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”。在他看来，王阳明良知之教，简易直接，一提便醒，乃是不二法门；不过必须勤加修证，即用存养和省克的工夫，故接着便论存养、省克。

四曰存养。梁启超先节录《大学》、孟子、荀子和宋明理学家关于存养的言论，并将其作用概括为五：一曰有存养之功则常莹明，无之则昏暗；二曰有存养之功则常强立，无之则软倒；三曰有存养之功则常宁静、安闲，无之则纷扰；四曰有存养之功则能虚受，无之则闭塞；五曰有存养之功则常坚定，无之则动摇。至于存养的方法，梁氏将其概括为主敬、主静、主观三大法门，并分别摘录古代儒家的相关言论，且加按语以说明。

五曰省克。省克包括省察和克治。梁启超认为，存养是积极的学问，克治是消极的学问；其工夫进路是先存养以立其大，然后随时加以省察、克治。梁氏认为，省察总体上可分为两种：一是普通的省察法，二是特别的省察法。普通的省察法又可分为两种：一是根本的省察法，二是枝叶的省察法。枝叶的省察法再分为两种：一是随时省察法，二是定期省察法。关于克治，梁氏摘录宋、明、清理学家的相关言论后，然后加以总结，认为其根本之法乃是“致良知”，因为良知一提便

醒,必能生出决心和勇气去对治己病。

六曰应用。按照儒家的观点,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事功是密不可分的,所谓修齐治平,实为一体。其实,前面的用功方法有的已涉及应用,如存养、省克部分所录内容就有讲如何在事上用功的,此即道学之应用。梁启超在此部分乃就前所未及者再节录一些材料,并略加申说,内容主要有二:一是谈任事成功的条件主要在于德行、操守、定力等,一是论士人如何带头转移习俗、陶铸人才。关于后者,梁氏尤其认同曾国藩的“精英主义”路线,认为道学的应用,全在于有志之士以身为教,以养成一世之风尚,造出时代之精神。

(二)《节本明儒学案》的主要内容

《节本明儒学案》是梁启超由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节钞而成。在万木草堂受教康有为时期,梁氏开始接触《明儒学案》,此后十馀年间,常读此书,并随读随将修身之精要语圈出。后因其思想的转向而专力编此一书。

《明儒学案》原书 62 卷,共有 19 个学案;节本保留了这 19 个学案,但卷数大为压缩,内容约为原书的四分之一。其中,原书每个学案的案序和人物传记几乎全部照录;语录则有选择性地钞录,原书 211 人中共 79 人有语录节选,所钞语录 800 多条。此外,节本有眉批 100 馀条,约 3000 字,这也是节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(由于版式的原因,此次整理将眉批改为小字夹注,并依梁氏习惯做法,前加“启超案”,以示区别)。

节本与原书的最大区别在于:后者一般被视为一部学术史著作(修身之言散布其中),而前者则完全是一本修身指导书。如何将一部学术史著作改造成一本修身指导书,梁启超作了一番精心的取舍工作。这种取舍体现了其良苦用心,既处处彰显节本在修身指导上的价值取向,也因之反映出了梁氏的编纂意图及其修身思想。

一是舍科学之语而取道学之言。在梁启超看来,科学和道学有明

确的分界：“道学者，受用之学也，自得而无待于外者也，通古今中外而无二者也；科学者，应用之学也，藉论辨积累而始成者也，随社会文明而进化者也。”（《节本明儒学案·例言》）所以，科学尚新；而道学有时即使是千百年前之成言，当世哲人也无以过之。科学尚博；而道学一言半句，可终身受用。梁氏认为科学有二，一是物的科学，一是心的科学；而心的科学又包括哲学、伦理学、心理学等，他特别指出，这些皆属科学而不属道学的范围。梁启超所作的这一区分关键在于，指出道学或修身之学主要在修在行，而不仅仅在于知识理论。他又认为近世智育日进，而德育日敝，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崇拜科学而蔑视道学，甚至误认科学为道学。节本的编纂，正是为倡导德育，而不是为增进智育。因此，对于原书大部分内容如关于理气、性命、太极、心体等哲学内容，因属“心的科学”的范围，一概不钞，而专钞“治心治身之要”（《例言》）。

二是舍辩论之语而取工夫之言。《明儒学案》有许多辩论之语，首先是辨佛。梁启超认为，宋明诸儒以辨佛为一大事，成为一种习气，即黄宗羲也在所难免，故该书中有大量的辨佛之语。梁启超有较高的佛学修养，首先他认为佛不可谤，谤佛固无伤于日月；再者辨佛流于习气，与实际修养工夫反而无涉。因此，节本于辨佛之说一概不钞，而取明儒工夫之言。其次，明儒言修身工夫，多互相针砭救正，所以言说日多，特别是阳明后学各学派之间尤其如此。在梁氏看来，皆是因病施药，如王阳明针对当时病源，施以药方，而后世服药过度，渐生他病，于是弟子加减药方以医之，故阳明后学之方实乃“药药之药”（即针对药方之药方）。梁氏认为，当今世界“药药之药”并不适用，只要服阳明的“公共独步单方”，就能受用不尽。因此对阳明后学的彼此辩论之言，一概不钞。惟因江右王学，多矫正当时放任之弊，而此弊至今学者多犯之，故稍加存录。

三是舍学术史精妙之论而取平易切实之言及诸儒传记。黄宗羲著《明儒学案》的目的，一为创制学术史，二为示学者以入道之门。作

为学术史，“诸儒之真面目必须备见，乃为盛水不漏”，必“其人一生之精神透露编中，乃能见其学术”（《例言》）。黄宗羲于此用功甚多，内容极为丰富，成就也较高，此书因之成为中国学术史的千古名作。但是，梁氏节钞此书乃为修身践履之用，即集中体现黄氏的第二个目的。因此，他往往将其所谓精妙之言删去，而留其切于实用、易得真正受用者。此外，明儒讲知行合一，尤重行，身教重于言教。而《明儒学案》中的诸儒传记，最能传达明儒人格、精神，故全部钞录，“以资高山景行之志”（《例言》）。

四是详王阳明及其后学重要传人而略其他人。梁启超学问的根底是陆王心学，尤其是王学。他最为服膺王阳明的“致良知”和“知行合一”，认为这是现代学者修身入德的最良法门。故其平日发挥王学之处甚多，节本也主要在传播王学及其后学。因此，节本在材料的选择上详于王学及其后学，其他则略之。如“姚江学案”（即王阳明学案）全部钞录，其次“江右王门学案”和“蕺山学案”所录也较多；而“止修学案”、“甘泉学案”、“诸儒学案”由于非王门，所录特少。

节本的眉批是梁启超平时读《明儒学案》的心得，眉批的增加进一步强化了节本的修身指导作用，“或可以促读者注意而助其向上之心”（《例言》）。具体而言，其作用主要有三：

其一，指出学者弊病或反省自身弊病，以期正视之。梁启超观察到，当时社会道德沦丧，关键在于不讲修身之学：“近世智育日进，德育日敝，皆坐此也。”因此，他希望学者正本清源，“本源不清，则学识不为益而反为害，可不惧哉？”而所谓正本清源，是先要认识到自身的病根之所在，故其批语多言及此，如：“我辈宜常常自审病根。”有时指出具体的病根，如：“此（按：即好名）是小子一生大病根。”“懒散精神，暮气也。暮气者，鬼气也。”有时针砭时人不肯去病，如：“当时学者以去病为第二义，其弊既若彼，今之学者以病为不必去，且明目张胆以保任拥护之，又将何如？”

其二,指明受用之方,望学者依此而用功。梁启超认为王阳明“致良知”和“知行合一”之教,简易直接,最能医时人之病。故其批语多及此,如:“拔去病根,阳明之药最良也。”“我以良知为君,彼自能保护我。”此外,他对王门重要传人的工夫之言,也非常重视。如对罗念庵言“收敛翕聚”涵养工夫一段,加批语云:“此段最是用力不二法门,天下无代价之物,岂吾辈学圣可以顷刻之悟而遂得耶?心至易动,不可不警惕。”再如对刘蕺山“慎独”工夫,加批语云:“此篇为蕺山勘道最微处,亦学者用力最吃紧处,我辈宜日三复也。”

其三,简要评价明儒工夫,提醒读者注意。这些评价言简意赅,点到为止,使读者或因此而警醒,或从此处而用功。如评王阳明关于“致良知”的自得之谈,曰:“先生之事,其自得之艰也若此,岂得曰‘顿’而已哉!”又如比较阳明与朱熹之论,曰:“以此(按:即王阳明致良知)与朱子即物穷理相校,真令人有挈领振裘之乐。”再如评刘蕺山的修养工夫,曰:“此讲已发未发,方是鞭辟近里。”“欲觉晨钟,发人深省。”“最能发明阳明法门。”

(三)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的主要内容

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的编纂,是梁启超对曾国藩修身之学进行的一次简要而精到的整理。该书从《曾文正全集》的书札、家书、家训、日记和文集中,将有关修身的精要之言摘钞出来、编纂成书。其摘钞比较简略,只在于“自便省览”,“但求实用”(《曾文正公嘉言钞·钞例》)。因此,该书可视为一部曾国藩修身格言集。

梁启超在个人的修养上,除受家庭和康有为的影响外,主要得力于两个历史人物,一是王阳明,一是曾国藩。如果说《德育鉴》和《节本明儒学案》主要是致力于阳明及其后学修身之学的推行的话,那么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则是着意于曾国藩修身之学的弘扬。

在梁启超看来,曾国藩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不世出之大人物,但他“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”,而于同代诸贤中“最称钝拙”,且“终身在拂逆

之中”。曾氏之所以取得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的成就，关键在于他不断地努力做修养工夫：“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。而困而知，而勉而行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，不求近效，铢积寸累。受之以虚，将之以勤，植之以刚，贞之以恒，帅之以诚，勇猛精进，艰苦卓绝。如斯而已，如斯而已！”因此梁启超认为，曾国藩的修身之学是人人可以学的，他正可以做我们的人生楷模；如此，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“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，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”。（《曾文正公嘉言钞序》）

总体而言，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立身、处事两个方面。其实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，下面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，对其略加分疏：

1. 关于立身之道，大致有如下方面的内容，并略加例举：

（1）立志。曾国藩首重立志，如曰：“人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识，第三要有恒。”“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，中有勇猛精进之心，末有坚贞永固之力。”其作用在于，如：“人之气质由于天生，本难改变，欲求变之法，总须先立坚卓之志。……古称金丹换骨，余谓立志即丹也。”

（2）知本，以方寸为师。曾国藩认为立身之本在我：“我辈办事，成败听之于天，毁誉听之于人，惟在己之规模气象，则我有可以自主者，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。”而我之本在于方寸之良知，当以方寸为师：“吾辈位高望重，他人不敢指摘。惟当奉方寸如严师，畏天理如刑法，庶几刻刻敬惮。”其实，梁启超本人也极为推重知本工夫，在《德育鉴》中将其当作修身的重要方法。

（3）主敬。曾国藩重主敬工夫，认为：“敬之一字，孔门持以教人，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，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。”其释“敬”字曰：“敬以持恭，恕以待人。敬则小心翼翼，事无巨细，皆不敢忽视。”曾氏认为主敬的作用在于：“主敬则身强……吾谓敬字切近之效，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，筋骸之束。”梁启超受曾氏此点的影响，其修身法门亦有“主敬”一条。